

這所學校的創辦，從一塊石頭說起

今天的四川成都人，大概很少有人會去想一個問題：2100 多年前，這片被叫作「天府之國」的土地上，文化是什麼樣子的？

答案可能讓人意外。在漢朝人眼裡，蜀地偏僻簡陋，根本享受不到齊魯那種儒家文化的熏陶。東漢的班固寫《漢書·地理誌》時，更是毫不客氣地把巴蜀歸入「南夷」一類，認為當地人是南方未開化的蠻族。

巴蜀當然有文化，三星堆、金沙就是明證。只是民族構成複雜，地理環境相對封閉，所以朝廷始終不能讓巴蜀徹底「中原化」，直到文翁的出現。

風雲際會：郡守在蜀都的「教改」試驗

文翁，廬江郡舒縣人（今安徽廬江一帶），從小好學，尤其精通《春秋》，以至於後來被察舉推薦，走上仕途。

漢景帝末年，文翁被派到蜀郡擔任郡守。他性格仁厚，愛護百姓，見蜀地偏僻，還保留著蠻夷作風，便打算有所改變。而當時的時代也給了他一個機會。

就在文翁擔任蜀郡守前後，後元三年（前141年），漢景帝去世，後來的漢武帝、16歲的劉徹即位。劉徹野心勃勃，希望能有一番作為，於是相當勤政，下令各地推薦人才。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，一個叫董仲舒的儒生脫穎而出。

他給漢武帝上了一道奏疏：治理天下沒有比教化更重要的了。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，不用教化這道堤壩去攔，根本堵不住。所以他建議在成都設太學，在地方設學校，用教育去改變民風民俗。

在此之前，秦始皇統一六國，嚴刑峻法以治天下，結果秦二世而亡。漢代吸取教訓，於是提倡「無為而治」的黃老之術，讓百姓

休養生息。然而這種「為政清淨」的治理方式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短暫使用，從長遠來看，「無為之治」弊大於利。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慾望都是無止境的，尤其當經濟逐漸復甦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時候，慾望膨脹，損人利己，避無可避。要實現道家倡導的「清心寡慾」，絕不可能。

所以漢武帝需要一套兼顧刑法與寬政的統治方法，而董仲舒的方案正好回應了這個需求：「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」。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。

於是，漢武帝下令在全國推行——聽起來容易，其實難度不小。誰執行？錢從哪裡來？讀書有什麼好處？為什麼要讀書？

這些問題，中央沒有答案。

文翁其實也沒有答案。

他在這個時候擔任蜀郡守，和董仲舒一樣通《春秋》，在「以教化治天下」這件事上，或者能算得上志趣相投。也因此，文翁開始在蜀郡「試驗」。

石室肇始：文翁的三項創舉

第一步，送人出去「留學」。

他從蜀郡各個縣的小官吏中，選了十幾個聰明機靈、有才能的年輕人，讓他們前往京城長安，到太學裡跟著傳授儒家經典的博士們學習。

然而，博士們可不會白白教你，錢從哪裡來？蜀郡離長安千里之遙，十幾個人去京城讀書，吃穿住行，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。文翁便縮減供太守用度的少府開支，省下來的錢用來買土特產，讓年底去京城匯報工作的「計吏」捎給博士們，算是學費和禮物。博士們收了禮，自然會對蜀地來的學生多加關照。寧可窮自己，也不能委屈了學生們。

過了幾年，這些青年學有所成，回到了成都。文翁非常高興，把他們安排到重要的職位上，讓他們發揮所學。這些人在後來的察舉考核中表現優異，有人甚至做到了郡守、刺史這樣的大官。

不過，送人出去「留學」，畢竟只能惠及少數。於是第二步，文翁便在成都市中心修了一所官辦的學校。這座學校很特別，是用石頭砌成的。為什麼用石頭？不知道，也

許是因為成都多雨潮濕，木結構建築容易腐朽，石頭不但堅固耐用，還能防火。總之，這座用石頭砌的學校建成後，人們叫它「石室」。

石室建好了，誰來上學？文翁「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」，從下屬各縣招收普通的平民子弟。為了鼓勵人們讀書，文翁還免除了學生的徭役。這些學生學完後，出路也很不錯。成績優秀的，可以補缺當郡縣裡的小官吏；差一點的，也能當上「孝弟力田」，作為對孝順父母、敬愛兄長、努力耕作的表彰。這就是文翁的第三步，讓人們意識到讀書不僅不用服徭役，還能名利雙收。如此一來，自然能吸引到很多人。

但文翁做得還不止這些。他常常從學官裡挑選學生，讓他們幫忙處理事務；到地方巡查，也會額外帶幾個通曉經書、品行端正的學生。一方面鍛煉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，另一方面也向全郡的官吏和百姓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：願意讀書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逐漸地，蜀郡各縣的官吏和百姓都覺得讀書是非常榮耀的事情，效果自然立竿見影。



▲圖1為文翁石室；圖2為文翁雕像；圖3為石室講經圖。

立竿見影：「學徒鱗萃，蜀學比於齊魯」

幾年後，蜀地風氣大變。大家爭著把孩子送進學官當弟子，有些富裕人家甚至願意出錢來換一個上學的名額。至此，「學徒鱗萃，蜀學比於齊魯」——齊魯是孔孟的故鄉，從春秋戰國以來就是天下文化的中心。

文翁辛勞，把一個邊遠蠻荒之地變成了很多人追慕文化的地方，到京師求學的學生和齊魯相差無幾。加上後來官員和學者的持續推動，巴蜀在漢代一躍成為中國文化高地。

晉代的常璩在《華陽國誌》裡給出了一句極高的評價：所謂「漢征八士，蜀有四焉」，漢代朝廷徵召的8位傑出人才裡，蜀地就佔了4個。這4個人，分別是司馬相如、揚雄、王褒、嚴君平，豈止當時傑出，個個也是名垂青史的人物。

司馬相如是漢賦的奠基人，揚雄是哲學

家、文學家、語言學家，王褒是辭賦家，嚴君平是道家 and 易學大師。一個從前被視為「蠻夷之地」的偏遠地區，居然能貢獻出全國一半的頂尖人才，文翁功不可沒。

文翁最後在蜀郡去世，官吏和百姓自發為他建了祠堂，每年按時祭祀，從來沒有間斷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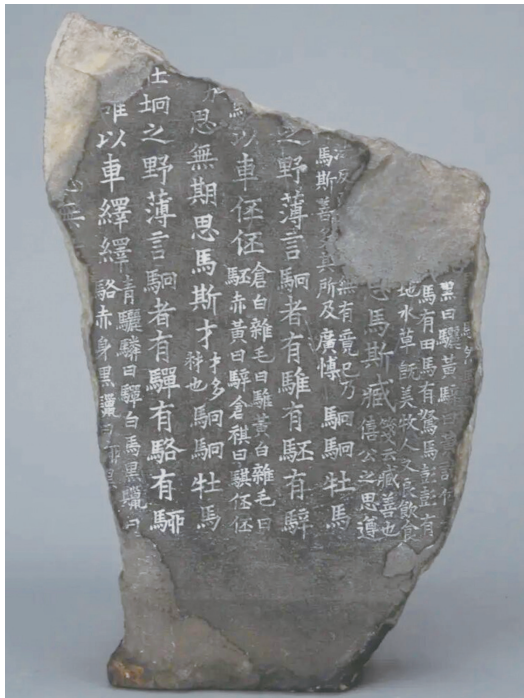
到班固寫《漢書》的時候——那時候文翁已經去世一百多年，巴蜀人依然愛好文雅，「文翁之化也」。

事實上，文翁辦學，不僅改變了巴蜀風氣，還影響了整個漢朝。

因為蜀地教化的成功，漢武帝下令全國的郡和國（漢代的一些諸侯王國）都要設立官辦的學校，目的正是以學校為載體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。



▲►四川博物院藏，後蜀（934—965年）時期的《尚書·君奭》與《尚書·說命中》殘石、《毛詩》殘石。



千載不熄：石經與廟學

不獨漢武帝，後世歷代也十分看重文翁石室。

東漢末年，成都遭遇一場大火，全城的官署、民宅、寺廟，同一天內全成了灰燼，整個成都幾乎被夷為平地。但奇怪的是，文翁石室的廟門竟然完好無損。於是新任蜀郡太守高朕決定重修石室，還在旁邊增建了一座「周公禮殿」，用來祭祀孔子和歷代聖賢。

此後一千多年裡，即便亂世，只要稍微安定，總會有人想起這座學校。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不但多次修繕擴建，蕭梁天監九年（510年），始興王蕭憺擔任益州刺史，還興辦學校，祭祀文翁。自此之後，當地百姓大多一心向善、遵從教化。到了五代十國，同樣戰亂的年代，但後蜀宰相毋昭裔不但重修了修文翁石室，還自掏腰包，刻了石經。之後，宋代官員不斷擴建重修。直到清初，巡撫佟鳳彩還在明末戰火的廢墟上重建了書院。

然而，一座學校被後人修了近50次，當然不只因為它的教化功能。文翁石室還有另一重身份：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把「學校」和「孔廟」建在一起的地方。東漢末年，高朕在石室增建「周公禮殿」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「廟學合一」：把祭祀孔子和聖賢的祠堂跟學校建在一起。學生每天在聖賢、偉人的眼皮底下讀書，現在豈非也是如此？

除此之外，文翁石室還有一樣寶貝：「蜀石經」。

五代後蜀時期，宰相毋昭裔在文翁石室裡刻了一套石經——把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，立在學宮裡，供學生們抄寫、校對、誦讀。在沒有印刷術的年代，相當於給學生印了一

套「永不磨損的教材」。

這套石經包括了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爾雅》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等，宋代又補刻了《公羊傳》《穀梁傳》和《孟子》，湊齊了13部，也就是所謂的儒家十三經。

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把儒家所有重要的經典匯總、審定、刻成一套標準版本。這套版本後來被抄寫、拓印、傳播到全國各地，影響了後世所有儒家經典的版本。某種意義上說，現在讀的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它們的「標準文本」都可以追溯到成都文翁石室裡的石碑。

也因此，即便後來石碑後來損毀，文翁石室仍然是中國文化史上繞不開的名字，儘管這個名字一直在變：漢代叫「石室」，東漢加了「周公禮殿」，唐代改「孔廟」，宋代叫「成都府學」，清代叫「錦江書院」，今天叫「石室中學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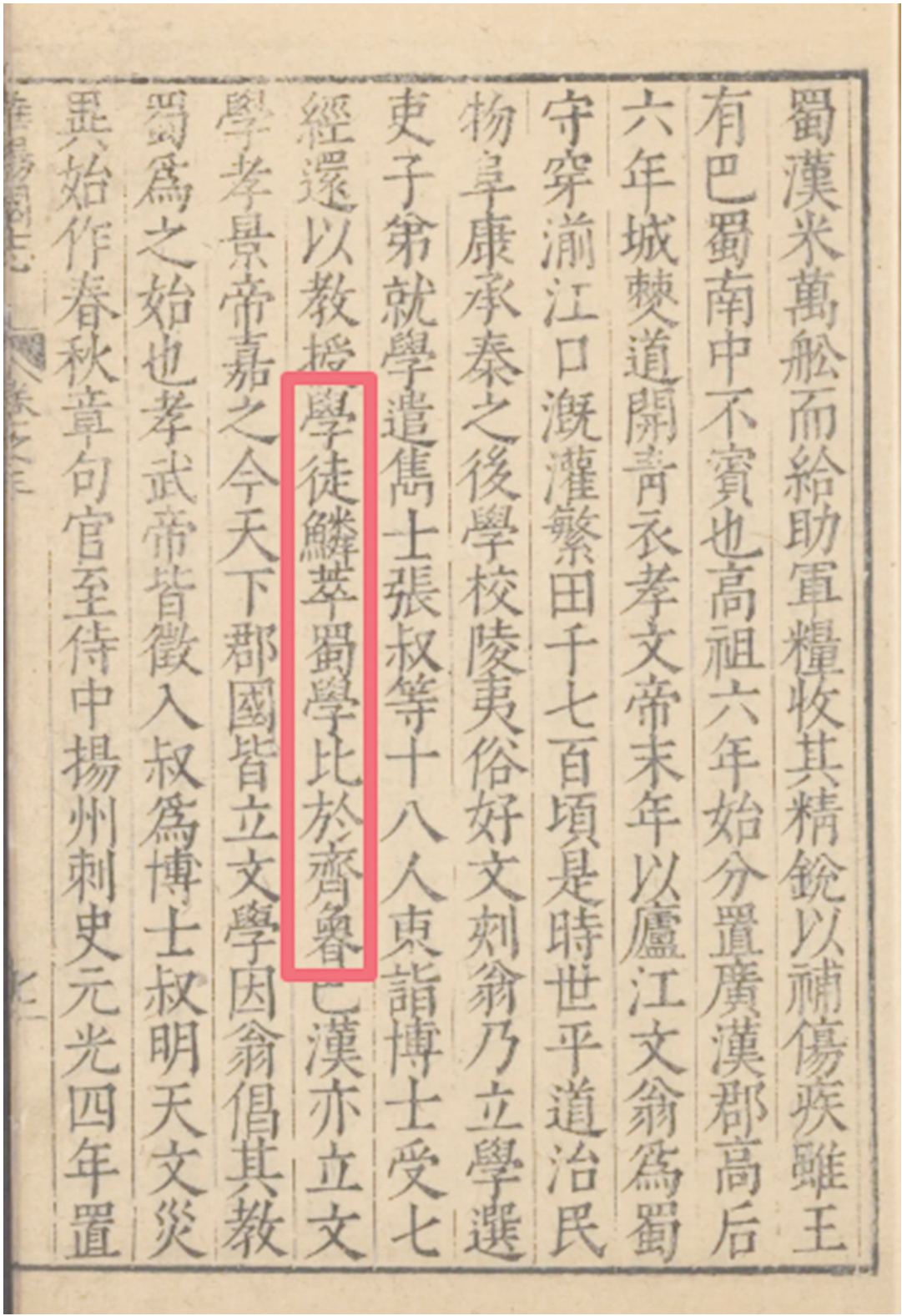
從漢景帝末年到現在，歷經十六個朝代，其間世事分崩離析、時局變幻不定，名字換了十幾種，壁畫沒有了，石經被損毀了，但2100多年來，在這塊土地上，始終有人教書，始終有人讀書。

而2100多年前，文翁在成都砌起第一塊石頭的時候，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正在創造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奇跡。他只是做了一個地方官該做的事：興教化，崇教育。然而千百年後，石室千載思故夢，縱有風雪讀書聲。

文翁不朽，石室長存。

作者 / 謝玩玩

本版圖文摘編自江蘇蘇州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，《華陽國誌》卷第三，東晉常璩撰，明吳琯刻本。